

当代作家学者散文丛书



进入九十年代

钟敬文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进入九十年代

钟敬文 著

172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马森彪
责任编辑：赵晓阳

进入九十年代

钟敬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25 字数：108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378-1652-2

I·1612 定价：7.50元

（注：原诗为七律，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部分文字，仅保留与主题紧密相关的部分。）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注：原诗为七律，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部分文字，仅保留与主题紧密相关的部分。）

历史平章付世人

（注：原诗为七律，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部分文字，仅保留与主题紧密相关的部分。）

（注：原诗为七律，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部分文字，仅保留与主题紧密相关的部分。）

我出生在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今年，依民族传统的算法，已经九十岁。照眼下一般流行的用语，可说是这个世纪的同龄人罢。

本世纪的确是——一个不平凡、一个坏平凡的世纪。从世界范围的情形说是如此，从我国中国的情形说也是如此。从关系到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看，中国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里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

本世纪一开始，就是义和团的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1905年，清政府对日战争失败，使国家进一步濒于危亡之境。——1911年，中国人民推倒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17年，第一次欧战结束，参战胜利国的中国却得到与战败国平等的结果。——1919年，全国爆发

了“五四”的政治、文化运动。——1924至1927年，大革命的兴起及挫折。——1927至1936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近十年的斗争。——1937至1945年，日本军队的入侵与全国人民的抗敌大斗争。——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1957年“反右”扩大化，许多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1958至1959年兴起“三面红旗”运动，厉行左倾路线。——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篡权。——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

以上所述，只是这段时期里一些关系较重大的事件，像人身上的骨骼。此外，还有那些次要的，就不一一赘举了。我作为中国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继续不断的重大事件的惊涛骇浪中飘渡过来的。

知识分子，对于周围的事物，都是比较敏感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巨大事变，不管他们是自觉地参加进去的，抑或是不自觉地（甚至于不容自主地）被裹卷进去的，那大事件总要在他们的经历上、精神上留下一定的烙印，甚至于斑斑伤痕。

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闻。但是，在这漫长历史的经历中，总有种种的感受和反应。如果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也可算是这时代的伟大史剧中的断片插话吧。

限于时间和精力，在这里，我只能就上述的重大事件中选择一部分，略谈我的经历和反应。

“五四”政治、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及文

化的大运动！它对中国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說，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娃娃，那么，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我已经是一个上过十年新旧学的青年人了。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事情，就我现在所能记忆的，只有两件：其一，在我们那小市镇中心的大街上，看市人们在围着念新政府的告示；第二，是我的家人（是不是母亲，已经记不清了）给我剪掉那条并不长却颇肥太的辮子。只此而已。至于“五四”时期的印象却不然了。在这之前，我已经上过两三年“子曰馆”，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一类的兔园册子，又进过半新式的学校，在学习算术、格致等同时，也诵读古代历史和古诗词，并且学作过“爱国论”及旧体诗。此外，还看过孙中山、温生才一类革命家的传记，这时我已经是一个雏形的知识分子了。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剧烈的、全国性的群众政治运动。当时，我们那比较偏僻的小市镇，虽然交通道路、交通器材远远没有现在便利，但是，发生在北京的事情却很快就传播到我们那里了，并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即刻投入了爱国的宣传活动中去。我被选为这种抗日联会的会长，当然要全心全意地奋力工作。我们的宣传队，在大街小巷演讲、呼口号，还把这种活动，推广到附近的大小村落。在市镇的戏台上，我们演出了宣传剧，以揭露敌人的野心毒手和汉奸们的丑恶面目。我本来是颇害羞的孩子，但是，这时也壮着胆子，敢于在瞬息的万目之下登台表演了。

在这种救国活动中，有一项意义极重要、办起来却又相当困难的工作，那就是禁止贩卖日本货。这是从经济上扼制敌人的方法。如果做得好，是可以收到很大效果的。在我们那小市镇上，虽不能说日货充斥，但也已经是到处可见。最惹眼的是洋火（火柴）和洋布（东洋布），后者已经渐渐代替国有的土布了。我们首

先是逐户清查，然后把它一一封存，并谆谆嘱咐以后不准再贩进这类货物。但商人大都看重眼前的利益，不肯好好服从这种办法，并千方百计对付我们。例如瞒骗存货，偷偷贩卖。有的还进行贿赂，或向我们的家长告状，希望阻止我们的行动。但是非我们意志所决，坚持原则。尽管他们使尽心计，乃至于怀恨，咒骂，总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和处理。

这种向青年学生威胁利诱的情形，在各地，可能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我当时虽然年纪还轻，坚决抵制了他们的歪风，但心里已经认识到旧社会壁垒的坚固，要改造它实在是相当费力的。

这种轰轰烈烈的、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虽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宣传、查货等活动渐渐解除了，但它给整个社会的震撼力量是相当强烈的。从我个人方面来说，它不仅是进行了初次社会实践和开始认识到旧势力的顽固，更重要的，是使我的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密切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像前面所说明，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接触到旧文学、旧学术，并且有些溺爱它们。但是，“五四”的文化运动却使我睁开原来有些迷糊的眼睛，它在我眼前展开一个新的学艺世界。我开始阅读新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学习创作白话诗、小品文。后来成为我终身努力的科学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种子，也是在那个时期播种下的。因为接触到北大的《歌谣》周刊，被深深吸引住了。此后，我便成为民俗学这位科学女神的忠实信徒。

总之，“五四”这个政治、文化的伟大运动，在我初涉人生道路的时候，惊醒了我，提携和哺育了我。我对它产生了不能磨灭的感应。它的遗泽一直长流到现在。几年前，我在所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一篇短文里，把它称做“我的启蒙老师”。这是再恰当没有的。只要我还活着，就将虔诚地怀念这位老师。

大革命的兴起及暂时挫折时期

由于中国人民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与外国殖民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政客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于是爆发了那些流血的大惨案。1925年的“五卅惨案”就是一个大例子。因为日本资本家的贪婪、凶悍，引起上海工人的反抗；而租界的殖民主义者公然为日人帮凶，枪杀工人，血洗了南京路。这种惨案，震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奋起抗争。许多进步的作家（如郑振铎、朱自清等）都发表了极沉痛的诗篇。

在这同时，国民党的左派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确定扶植工农、清除军阀的政治方针，并接受前苏联的援助，建立革命新军。在清除广东军阀及北伐进军中，正节节胜利，眼看正义之师就将肃清大陆，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而正在此时，国民党的反动派却叛变了革命，实行所谓“清党”，屠杀工农群众及革命人士。这是现代人民革命史中的一个重大的挫折。

我于1926年秋到广州。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北伐，国共关系也已经现出裂痕。但是，广州原是革命发源地，这时是革命大后方，它还具有一定的革命的吸引力。许多北方的进步青年都来这里取经或参加工作。当地的工农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呈蓬勃的气势。进步的文化也很繁荣，有专门出售革命书刊的人民书店更有《人民周刊》等进步刊物，还有创造社出版部和北新书局等北方进步书店，而且都有分部或分店。

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如郭沫若、郁达夫等虽然已陆续离沪（郭参加北伐军，郁回上海办创造社刊物）但创造社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如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等还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

学教书。还有其他进步作家如王任叔、董秋士、刘乾初等也先后到了这里（我跟他们的认识以及合作翻译孩童民歌，就在这些时期）。到了次年春，孙伏园、鲁迅也先后到达，但那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

我虽然生活在学院里，但这种社会的大气候自然要影响到我。我开始阅读革命的书刊。刊物方面，除了阅读全国性的《向导》、《青年周刊》之外，也阅读本省的《人民周刊》以及《少年先锋》之类。在书籍方面，现在所能记得的，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译本）、《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前苏联党校教本）以及《社会主义史》等。

当时，我除了在《少年先锋》发表些文章之外，又在岭南大学的《南风》上发表过迷恋描写去俄京留学的诗。《到莫斯科去啊！》。诗中表现了我对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敬仰和对于此行行的羡慕。我也赠诗台湾革命青年张秀哲同志，并为审阅所译《世界劳动问题》的稿子（后来我在杭州，还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散文）。1925年的沙基惨案，是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南方人民犯的一次罪行。我看了一个画家所绘制的《沙基惨案图》，悲愤之余，写下一首新诗（该诗曾收入我的新诗集《海滨的二月》，1930年刊）。鲁迅到广州时，我曾与友人去访问他，写了《记我鲁迅先生》（此文近来被收入《钟敬文散文选集》中）。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反动派的叛变而暂时遭到挫折。但革命并没有因此断绝。“东边不亮西边亮”，革命的力量终于重新聚集起来，并且不断发展。经过十年内战，它终于成为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

当革命遭到挫折时，我心里深感悲愤。此时精神上受了这种打击，加以个人感情生活上的某些苦惱，我一时陷于颓废和悲观。

但并不因此沉沦。因为许多革命同志和陆师同学们神圣的血在我脑子里闪着光。我决心在学术上努力，为未来新生的祖国服务。因此，我曾在那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另一方面，也更加致力于民众的文学、艺术及有关理论的学习、探索。由于这种努力，使我在下一阶段的抗日战争中能够置身前线，并为战时前后方文化尽些微力。

日本侵略与全国人民奋力抵抗时期

1934年春，我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职务，到日本进修，为的是充实自己民俗学等专业的知识，以便将来进一步为祖国更好地效力。1936年夏，我回到中国，仍住在杭州，从事教学与研究。但是，日本已经把黑手伸到了华北，国家形势岌岌可危。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暂时形成。全国人民又欢喜，又兴奋。因为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就在眼前了。国民党政府为了普及军事知识，加强抗战实力，命令各学校师生都从事军事训练。我工作的学校在离杭州二三十里的一个山坡上。我们每天都练习枪操，精神十分振奋，认为扛枪卫国，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六十年代我所作的《花甲杂诗》中有一首就是吟咏此事的。诗云：

关东沃土已沉沦，
逐逐狼心未有垠。
一例练枪期卫国，
非常时节敢因循？

第二年(1937年)夏天芦沟桥抗战的炮声响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感到紧张和痛快。可是，很不幸，当时我因为患伤寒病，正僵卧在杭州一家医院里。直到敌军逼近这座危城时，我才被用山轿抬离杭州，溯富春江西上，直到安埠这个小市镇，才住下来休养。病稍愈后，又由上饶转南昌、衡阳，最后到达桂林，暂时在从无錫移来的江苏教育学院等校教课。

当我初到桂林时，适遇原来暂驻衡山的联大转移昆明，一部分师生都从这条路走。我在湖边旅馆见到朱自清先生。跟他谈到战区和沦陷区文物遭破坏的情形。朱先生用豪迈自信的口气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他说出了当时我国大多数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心里话。那时桂林正处在敌机的轰炸之下。这时，我任教的教育学院，地址在漓江东边的七星岩旁边。我的住所却在城内榕湖附近的马皇岩。白天日机常来轰炸，市民都跑到郊区的岩洞去躲避。但避不胜避，往往就蹲在寓所里不走了。有时飞机投弹，落在住所前后，那古屋的尘埃和墙壁的灰泥纷纷落到我们头上或地上。我们切齿之余，更加强了抗敌的决心。我当时教的是国文，但在讲解中随处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1938年春，我因参加全国科学规划的会议，重到桂林。会余去寻南门内的旧居，已经被拆毁，新建了新楼。我不自禁地口占了卜录绝句。

战时寓寓古南门，
霹雳长雷切齿闻。
谁说传经心事苦，
花桥风雨往来频。

它多少传递了当时我的境况和心态。

这年七八月间，第四战区博官司令部的政治部在广州成立。友人尚仲衣博士（进步教育家，为一二·九运动北伐三位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教授之一），被任为第三组（宣传组）组长。他来电要我去共同工作，我也不甘心在后方躲避飞机和听炸弹的生活。于是，买舟南下，经过梧州，转到广州。我在政治部的职称是让校视察专员，实际却是帮助第三组做对民众及敌军的宣传工作。当时，第三组有许多共产党员，如叶光甫（即孙大光）、石群澜、黄新波等。我们颇能通力合作，并且使我受到教益。

同时，因为国共合作还没有受到较大的破坏，在广州，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与党外左派）还有一度活动余地，如出刊物（《救亡日报》、《新战线》等）以及各种反日的政治性、文化性集会都还能进行。因此，广州市一时颇形成一种进步的昂扬气氛。这不但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利，也使我在密切的合作中得到有益的锻炼。

由于粤军的抵抗不力，使敌军得以长驱直入，很快就迫近了广州市。战区长官司令部北撤三华，政治部也随之北撤翁源。记得我们离开广州时，坐的是最后一班火车（接着就停驶了）。那是九月的黄昏，车站电灯通明，万头攒动，秩序混乱。救亡日报社的夏衍、林林等闻声到车站送我们（他们要坚守岗位，要出版最后一张报纸，然后才撤离，从西江往广西）。我后来赠夏衍的诗，开头两句云：“话曾感极句难搜，危驿千灯照别愁”，写的正是这个情景。

在火车上，我恰好同希冠拳君同坐在一个装货物的车箱上。他原是我留学时相识的，在政治部时，他又是长官司令部的同事（他在司令部编辑一种信息性内部刊物《国际一周》），我们有时

也见面谈谈。这次完全是出于偶然的。白天，敌机不断跟踪侦察和投弹。因此，火车只得停驶，乘客也各自下车找地方隐蔽。记得那一天，我跟他到离车路不远的一个小村里，在农家吃了饭之后，就转到附近小树林里，我们既痛谈政局，又漫谈文学（他熟悉德国文学）。翻手就在草地上睡觉。直到天色黑下来，火车鸣笛催客，我们才回去躺在那些似乎是盐包的临时床铺上。

经过了一番跋涉，我们到了翁源，驻扎在城外的一座古庙里。这里离前线比较远，听不到枪声、炮声，部里暂时也没有安排什么工作。但是，为了警戒，部里人员，夜里须排班巡逻。我这个专员也不能免。这时已秋高，在山野里，晚上颇感到寒意。但穿着戎装，拿着武器，虽然没有交火的事，也多少有些自豪的气概。六十年代前期，我所写的回忆诗篇《花甲杂诗》里，有一首就是状写那些时候的情景的：

大鹏湾失羊城陷，

到耳军精日日非。

最忆翁江严逻夜，

高高霜月照戎衣。

在当时，想起这次广州的失守，我的心情很难过；可以看到我国旧式军队是怎样有名无实。当时正值重阳节，我满腔悲愤，曾经口占了一首七律。现在此录出，以见当时那种如沸的心情。

一凭泉此地建重阳，

思陟危峰瞰犬荒。

万里西风丛血泪，

百年佳节几杯觞，
 谗冲白燕真成毒，
 梦里黄花很有香。
 戮力未宜和议在，
 翁流宁识此心伤？

第三联首句，用南宋末所传“白雁来”照应“伯彦来”的民谣，以指日军的入侵广东。第二句暗喻广东军队的“银样蜡枪头”。结联意谓我抱着满腔热血回到故乡，还没有尽到力量，便见到这种败局，心里是怀着抱憾不满的。那日夜奔流着的翁江之本又怎样知道我的痛心呢？大有“有苦无处诉”的意思。

由于广东军事的失败，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派率入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四战区司令都被改组，政治部自难逃毒手。第三组是个盘查区，从组长起到许多同志，多被解职了。组长撵了一个他们派系的人。我暂时被留下了一段时间，教教授训练班的日语工作。这期间，我精神感到压抑，在所作诗歌里表现出来。例如《南雄感兴》云：“入海屠鲸意壮哉，眼前琐琐负初来”之类。不久我自请离职。又在地方绥靖公署政治部住了一些时候。主要的活动，是跟杨晦、黄药眠等作家到前线去慰劳军民和搜集写作抗战文学资料，并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

恰巧这时候，中山大学从云南激江撤回粤北，招我去教书。我就于1941年初回到中大中文系任教（1929年秋至翌年夏，我也曾经在该系工作过）。过去两年多不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不但使我领会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及其根源，更使我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到实践和印证。它像创世神话里，那神人所捏的泥人，被他（或她）吹了气之后，就

活起来了。我有了这种精神的变化，虽仍然回到比较狭小、静止的学院，但是，我对学问、学生等的看法和态度就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我这回在中大任教数年中，几乎年年都冒着被解职的危险（到了1946年夏，国民党已经颁发了杀气腾腾的“勒乱令”，就再无法避免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对于当时抗战不力，忙于消除异己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这些人的确是怀有异心的。

在抗日战争前期，我的精神收获，除所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化之外，在学艺上也有些成果。首先，我重新写作了一二十首新诗（结集成《未来的春》，1940），它是在我第一个新诗集《海滨的二月》出版十年后写成的；在思想、感情和风格上都具有这时期的明显烙印。其次，我写作了近十篇的战地报告文学。在二十年代中后期，我虽然出版了三个散文集，但是，内容大都是抒写个人心情及品题山水、人物的。但是，这时期的报告却是描摹火热的现实事象，并寄寓着我眷爱祖国的激情，文词也较为整饬、洗炼。这是我散文写作史上一个新垦地。此外，我还写作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短论、序跋、讲话稿及数十首旧体诗。这些大都有着新情思、新境界。上述这些成果，本身未必有什么超越之处，但是它是与当时民族的命运与人民的哀乐联结在一起的，也是与我这时期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动和腾跃血肉相关的。

战争真是一个红炉，它烧毁了许多东西，也炼铸了许多东西。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期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切盼着从此停止干戈，和平休

养，以恢复元气。但国民党反动派出于个人野心，竟不顾广大人民的死活和呼吁，企图凭藉某种国际势力，开罪人民的进步力量，以继续自己的暴力统治。看错了形势！在经过三年的智勇与铁血的较量后，而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革命人民的领袖终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果然，大陆上从此建立了性质全新的政权。

在天翻地覆的四十年代里，我个人的经历大致如下：1941年，我从当时广东军政、文化的中心曲江，回到中大教书。那时中大文学院、法学院和师范学院都有一些进步教授，他们不但具有进步思想，而且在业务上也比较优秀，因而得到进步的和大多数学生的信任、爱戴；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这些人利用特工人员和反动学生，监视进步教授和学生，并制造谣言，横生枝节，企图破坏进步活动或排斥进步师生，使之被迫离校。这种情形长期持续着（越到后来越变本加厉），一直到反动派的势力在大陆覆没，学校回到人民手里才告停止。

我返回中大文学院教书之前，在政治部等机关工作过。这段历史，当地特工人员当然是掌握的。到校后，我又与进步教授（如王亚南、梅棻彬等）和学生有交往，这也瞒不过他们的嗅觉。因此成了他们（特工人员及特务学生）心目中的猎物。他们为了工作的便利，对我故意表示亲热，有的还利用当时颁行的“导师制”（即教授带领一些学生进行课堂外的教育）；自认我为导师，经常出入我的寓所，以便视察来往人员和侦察我的行动。

进步学生为了保护我们（也可以说，为了保护人民的进步事业），早已私下通知我这种人的真实身份和用意。我自己由于过去

的生活经历，对这类人也抱有一定的警惕性。因此，并没有怎样上当。但必须时常防备他们，不免平添了许多麻烦，有时还导致意外事故。

记得中大搬回广州石牌之后的第二年，校中的特务学生（也就是我的“导生”）活动很猖獗。我为了逃避他的纠缠，晚上往往到附近同事的住所消磨时间。那时学校虽然已经复原，但战争时期遗留的东西，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例如宿舍区住宅间的壕沟就没有填平。有一天晚间，我从同事住所回家，在黑暗中坠进一条壕沟中，好不容易才爬了上来。但胸部受了重创，痛楚异常。医治几个月，才基本痊愈。这块胸内的伤痕，现在每次检查身体时，X光照片上还历历可见。看了这条长存的印痕，并不使我感伤。我想起那些岁月，有的敢说公道话的教授突然失踪，有些教授因为反对内战就被特务一枪送了性命，还有无数在疆场流血牺牲的战士，以及在监牢中被暗地处决的革命志士；比起他们，我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一定要从它那里找出一点意义来的话，毋宁说它是在那昏天黑地的时期里，由祸国殃民的特务制留在身上的一点铁证！

我在中大的几年中，每年暑假，学校当局都要接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不允许继续聘用我们的密件。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终未能达到其目的。至1947年，国民党发动派颁发了所谓“勒令”，学校当局就抵挡不住了。于是，我跟法学院的几位教授被非法解聘（因为聘书是跨年度的，此时并未满期）了。有的教授事前还被军警绑了架。

这年的七月末，我把自己所指导的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毕业考试打理完后，即化妆坐夜船到了香港。香港此时已是一座政治都市，许多民主党派的活动机关，都从大陆迁移到这里。中共